

儋州治所的变迁

■ 陈有济

儋州设置郡县的历史，始于西汉的汉武帝时期。自中原王朝在儋州设置建制至今，儋州的固定治所几经变迁，即三都旧州坡—高坡（中和）—新州—那大。

三都旧州坡，儋耳郡在这里设治。儋耳郡的设立，是在汉武帝征伐南越国之后。

西汉元鼎五年（前112年）夏，作为汉朝附属国的南越国发生政变，国王赵兴与王太后在准备入汉朝见汉武帝时，被国相吕嘉杀死，在南越国的汉朝使臣也全遭戮杀。吕嘉另立与赵兴同父异母的赵建德为王，并伏灭已进入南越境支援太后和赵兴的二千汉军。

吕嘉的反叛让汉武帝大为震怒。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汉武帝发10万大军征伐南越。这次军事行动，有两路汉军分别由路博德和杨仆率领。路博德当时是卫尉，受封“伏波将军”，杨仆是主爵都尉，受封“楼船将军”，二人都是名将。

元鼎六年（前111年），杨仆率部一路连败敌军，路博德稍后赶到与杨仆会师。两军会合后，直扑番禺。不久，番禺城破，吕嘉携赵建德逃入海中，后被抓获，南越之乱终告平定。同年，汉武帝在南越国故地设置海南、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个郡。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在海南岛上开置儋耳郡和珠崖郡。

儋耳、珠崖二郡设立的时间，另有一说是元鼎六年（前111年），两说各有理由。儋耳郡领五县，其中有儋耳、至来、九龙、乐罗四县，另一县无考。儋耳郡的辖区相当于今海南岛的西部和西南部，郡治在儋州西北的三都旧州坡。杨仆带领部队在这里筑了一座“二百六十步，高一丈四尺”的郡城。始元五年（前82年），汉昭帝罢儋耳郡，将其辖区并入珠崖郡，由珠崖郡统辖全岛。东汉、三国时期，都曾复置过儋耳郡，只是郡治未详。

高坡（中和）成为儋州的政治中心，一般认为始于隋朝，与岭南少数民族女首领冼夫人有关。

梁武帝中大通年间（529年—534年），“海南儋耳”千余峒归附冼夫人。冼夫人是高凉郡人，高凉郡即今广东茂名、阳江一带。冼夫人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她一生以身作则，致力于岭南的民族团结事业，积极在岭南传播汉族文化及汉族封建制度的礼教观念，推行各项政令。

由于冼夫人请命于朝，梁武帝在海南岛置崖州，崖州治所同样设于三都旧州坡。（有的志书则认为，崖州初在西汉珠崖郡故地，约至梁代后期才移至西汉儋耳郡故址。）到了隋朝之时，因为“城濒海，每多水患”，冼夫人将崖州治所移到有大江流过、条件更好的高坡（中和）。

冼夫人亲率族人筑城，到了第二天早上，一座新城已筑好。一夜之间筑成一座城，明显是对冼夫人神化的事实。隋代这次迁城之后，儋州治所一千多年没有再改址。

中和作为儋州州县治所的历史，在1920年被画上了句号。是年，民国局势动荡造成中和被焚毁，同年冬儋县县署移驻盐场村（今属新州镇）。1922年儋县县署移至白马井镇。到了1925年，儋县县署转驻敦教坡（今新州），这才稳定了下来。

新州一开始是建设县署及中山街、仲凯街，不久后陆续修建廷芳、民生、民权、石牛街等，逐渐呈现出县城的规模和面貌。神奇的是，早在明代之时儋州举人唐维的父亲唐朝胤就曾建议将儋州州治迁到敦教坡。唐朝胤在去世的当天，还对迁州治的事念念不忘，“惟呼曰：‘迁州！仅识之，必于顿骄（敦教）坡而后可。’”

儋县治所由中和改到新州，中和开始被人称为老州，与新州的名称相对应，也有别于三都的旧州。

那大成为儋县治所，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海南解放，尔后岛上行政区划出现几次大的调整。1956年10月，中共海南岛区委员会决定，划出儋县的第六、七区和临高县的第五区，成立广东省海南行政公署那大办事处，筹备那大县。

1957年5月，国务院第48次全体会议通过，正式批准设立那大县。到了1958年12月，海南的行政区划又进行一次较大的调整，其中那大县被撤销，行政区域划归儋县，县城定在那大。至此，新州作为儋县县城的使命结束。

那大成为儋县县城，获得迅速发展，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建设成海南西部最繁荣的一座城市。1993年儋县改为儋州市，市府驻地也是那大。2015年儋州市由县级市升级为地级市，市府仍驻那大。

（本文作者系儋州地方文史专家、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文史荟

投稿邮箱 wsh_hndaily@qq.com



海瑞

16 载海南作为

诗文会友奖掖后进

曾庆江

海瑞作为古代最有影响的清官之一，被人们称为“海青天”，享有极高的声誉。但事实上海瑞的仕途并不顺利。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37岁的海瑞考中举人，但是随后两次参加进士考试均落榜，最终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接受吏部分配到福建担任南平教谕，由此开始了坎坷仕途。隆庆四年（1570年），在应天巡抚任上的海瑞因官场倾轧被迫离职返回琼州。直到万历十三年（1585年），已经73岁的海瑞被朝廷起用，两年后逝世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从被迫离职到再被起用，中间长达16年之久，这期间海瑞都做了些什么？



海口市海瑞墓管理处陈列馆里的海瑞画像。本报记者 陈耿 摄

回到家乡海南的海瑞已无官职在身，但是他依然尽自己所能为百姓请命，从而造福当地百姓，使得百姓争相一睹海公颜貌。

早在出仕之前，海瑞就写有《乐耕堂》一诗：“源头活水溢平川，桃色花香总自然。海上疑成真世界，人间谁信不神仙。棋惊宿鸟摇深竹，歌遏行云入九天。良会莫教轻住别，每逢流水惜芳年。”将农耕生活写得如此诗情画意，实属难得。但是现实生活并不如此。他返乡不久，海南就遭遇了一场极为严重的海盗之患。

据万历《琼州府志》记载，隆庆六年（1572年）二月，福建漳州海盗勾结倭寇，从广东廉州渡海，先后围攻临高、定安、万州、文昌、乐会、琼山等地，杀掠村镇，如入无人之境，官兵贪生怕死，畏葸不前，百姓深受其害。海瑞针对现实情况痛心疾首，于是多次写信给两广军门、统领广东广西的武官，陈述海盗之患，批评官兵无所作为，并提出标本兼治的策略。比如在给刘崇川的信中，勉励“为地方立千百年业，不虚公为一时赫赫功”；在给殷石汀的信中，更是希望能够加强海南的防务，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海瑞为民请命的拳拳赤子之心，可见一斑。

丈田，均税一直是海瑞任上的重头戏。他离职返乡之后，依然对此工作十分关心。他得知明朝开国以来两百年间，海南从没有“丈田”之举，非常兴奋，因为他意识到“一丈田而百弊清矣。土君子为部民久长之计，无过于此”。海瑞多次和琼州分巡道唐敬亭进行沟通，强调这一举措“千载一时，然此一大美事，亦一大难事”，并结合自己先前的经验提出相应的建议，帮助这一工作做好落实。

对于清丈工作做得好的地方官，如文昌的罗近云、临高的陈振源等，他都写信予以勉励褒奖。而对于琼山为了赶进度，便在未到现场测量的情况下随便填报数字的做法，也对地方官通过书信予以警醒：“丈田人目不曾一见田形之面，足不曾一履田丘之地，中有奸弊，罪归何人？”本来可以做闲云野鹤的海瑞，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和地方官反复沟通，甚至不惜发生争执，就在于他为民请命的情怀。

正因为海瑞多次为民请命，因此获得百姓极高赞誉。南京任上被迫去职时，百姓“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返回海南后，百姓怀着仰慕之心前往求见，只有一句话：“无事，愿一见海爷颜貌耳！”真可谓是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海瑞故居牌坊。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瑞在任上时，殚精竭虑，公务繁忙，因此无暇顾及社会上的各种应酬。返回海南老家之后，由于没有了在身公务，因此各种应酬活动开始多了起来，诗文会友成为他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据明史研究专家蒋星煜统计，海瑞返乡闲居期间，先后给人写序文41篇。这些序大都是为在海南任职的官吏升迁、调走或者致仕时所写，对他们在海南的功绩予以肯定。比如，罗近云当时是负责清丈定安田地的文昌县令，做事认真，成绩突出，因此被朝廷擢升为钦州太守。在临走之际，他请海瑞作序，海瑞欣然命笔，这就是《赠罗近云代丈定安田序》，称赞其“才大过人，爱人之仁，一介之操，又足以镇之”。地方官员多方筹资重修琼山学宫，也让海瑞心生感动，于是写下《重修琼山学宫记》，感慨地说：“一心在民，亦未尝不一日一心在士，其功如此。”

一些地方文史资料将海瑞打造成不近人情的官员，其实大谬。对于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官员，海瑞是与其战斗到底，但是对于爱民如子、政绩卓著的官员，他也是通过各种方法予以推崇奖掖的。这才是一个立体的海青天形象。

南返琼州后，海瑞将更多时间用来看书写诗著文上。比如，他在这一时期写的《倭犯钟司徒墓震霆遁去》就是一篇饶有趣味的诗作，而且还具有史料价值。隆庆六年（1572年）的海盗之患给当地百姓带来灾难。可恨的是，海盗还和倭寇勾结在一起，由于抢不到财物，便通过挖掘坟墓的方式向坟主索财。有一次，这些歹人打算挖掘曾担任兵部侍郎的钟芳的坟茔（位于今海口秀英区东山镇钟宅坡），正在此时，雷霆大作，风雨交加，歹人最终落荒而逃。“谁谓棺占定事？犹遗赫怒庇重冈。丹忱贯石莹俱古，赤电明心山亦苍。”海瑞一方面肯定了钟芳的功绩，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向先贤致敬。

尽管海瑞没有中过进士，但是学问人品有口皆碑，当地士子极为推崇。他回到家乡之后，当地读书人就有不少登门求教的，许子伟就是其中一例。幼年时，许子伟就受到丘濬、海瑞等本地名贤的影响，刻苦攻读。在海瑞南返琼州后，许子伟登门拜海瑞为师，学问有了很大长进，先后于万历十年（1582年）、万历十四年（1586年）中举人和进士，进而走上仕途。

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病逝于南京任上。许子伟奉旨护送海瑞灵柩回海南安葬。由于海瑞没有子嗣，许子伟特地在墓旁搭棚栖身，为恩师守制三年期满，才返回京城履职。这自然体现了许子伟知恩图报的情谊，更显示了南归琼州期间海瑞对青年士子的提携奖掖。

（作者简介：曾庆江，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甘肃省博物馆展厅内的文物铜奔马。资料图

最近，“马踏飞燕”的玩偶因其丑萌的外形火出了圈，其创意取自甘肃博物馆的青铜国宝——东汉铜奔马。1969年，甘肃武威新繁人民公社的村民在挖防空洞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座埋藏有大量青铜车马仪仗俑的古墓，从随葬的五铢钱等遗物来看，这是一座东汉末期（一说魏晋时期的）张姓将军墓，后被称作雷台汉墓。出土的99件铜车马仪仗俑中，有一匹特立独行的骏马，它身无鞍鞯，四蹄翻飞；恰巧一飞鸟从其身旁如箭掠过，马蹄走云乘风，竟踏上鸟身。这件静态的青铜艺术品表现出了马踏飞鸟时刹那的动态之美，是铸铜技术与雕塑工艺相融合的珍品。

“马踏飞燕”之名为大家所熟知，一说为郭沫若先生所题。从现有的记录来看，最早提出此名的是当时在甘肃文博系统工作的王毅先生。1971年，郭沫若曾和柬埔寨首相宾努来到甘肃省博物馆参观，他们惊叹于铜奔马“一足踏鸟、三足腾空”的艺术之美，郭先生可能对朗朗上口的“马踏飞燕”之名表示过认可。对于这件铜奔马如何定名，多年来

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其实，铜奔马的名称看似很短，实则包含了质地、特征和器形，符合文物定名规范。但马蹄下的飞鸟是这件艺术杰作的点睛之笔，作为骏马躯体的重心，维持着这件艺术品的平衡，定名中不提又未免遗憾。有学者根据西汉张衡《东京赋》中“天马半汉，龙雀蟠螭”的名句，认为“马踏龙雀”之名才具神韵。龙雀是传说中的凤神，似乎更能衬出奔马的神速，但晋代郭璞曾曰：“飞廉，龙雀也，鸟身鹿头者。”此鸟尾部未分叉自然不似飞燕，但也不是鸟身鹿头的龙雀形象。

也有人提出“马踏飞鹰”的命名。

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的战国匈奴王金冠的顶端是一只展翅的雄鹰，此鹰推测是匈奴王的象征，马蹄下踏着象征匈奴的雄鹰，与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可能有异曲同工之意。值得一提的是，铜奔马的出土地武威与霍去病还有渊源：西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远征河西，多次大败匈奴，为彰显汉王朝和霍将军的“武功军威”，所以此城被命名为“武威”。《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四十》记有张

史志琼崖

身在乡野心怀国运

东汉铜奔马

刘亭亭

蒙古博物院收藏的战国匈奴王金冠的顶端是一只展翅的雄鹰，此鹰推测是匈奴王的象征，马蹄下踏着象征匈奴的雄鹰，与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可能有异曲同工之意。值得一提的是，铜奔马的出土地武威与霍去病还有渊源：西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远征河西，多次大败匈奴，为彰显汉王朝和霍将军的“武功军威”，所以此城被命名为“武威”。《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四十》记有张

对于这件铜奔马如何定名，多年来